

# 天价酬劳：网红的钱，应该怎么花？



九十年代，很多人借着发展的春风，快速积累起大量财富，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社会问题，与之匹配的则是关于“财富观”的讨论。有一篇文章写得蛮中肯，令人印象深刻：财富如水，如果只有一杯水，大可以自顾自地饮用；如果拥有一桶水，那么就要学会和家人、团队分享之，这种状况多集中于一些作坊式创业者；但如果拥有一江春水，就需要造福社会，总想着占为己有，财富就会变成灾祸。显然，这些真知灼见犹如天上的星星，有种永恒的光辉，三十年之后，同样适用。日前，头号社会事件无疑就是网红薇娅被罚款13.41亿，一纸重磅消息，各路专家纷纷解构之：商业、金融、互联网、资本控制都成为薇娅的分泌物，而普通人则调侃着如何能赚到13.41亿元，答案是：依照现在的平均月薪，要从山顶洞时期，工作到2030年，才有望达成小目标。

薇娅税金事件，释放很多信号，在全社会范围内引起广泛讨论。全国各地的头部主播都开始自查自纠，争取得到宽大处理，可更多地普通人依旧疑惑：网红如何能赚到

这么多钱，他们又替社会创造出怎样的价值，才能配得上如此天文数字的收入呢？更High level讨论则是：全社会的财富，应该流向哪里？

天价酬劳，网红们应如何纳税？前不久，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稽查局依法对网络主播薇娅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总计13.41亿元。而早在一个月前，网络主播雪梨、林珊珊因税金问题，分别被罚款6555.3万元和2767.2万元，一个个都是天文数字，而且经财税、法律界专家裁定，有关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公平公正。加之，网红们在接到罚单之后，均立即表示：会马上筹措资金补交税款。这些事项足以证明，网红的天价酬劳确定真实存在。同时，有关部门呼吁：网络红人要自觉依法纳税，承担与其收入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

主播们一人的补交税款、罚款金额从数百万攀升到十数亿，不禁让公众哗然：薇娅们的天价酬劳，应该如何正规缴纳税款，而她们创造的社会价值，又如何评定，能否与其收入相匹配呢？这些疑惑估计会让薇娅再热一阵子。

其实，电商直播被捧成风口，也就两三年的光景：2017年，电商直播的规模不超过190亿元，而后一路飙升、野蛮生长，市场规模随之扩大到9610亿元，可以说，李佳琦、薇娅们功不可没，或者说是背后的资本功不可没。网红利用直播平台，把流量的效率运营到头部，大幅降低获得客户的成本，

提高其转化率。在如此大规模的风口之下，头部主播的提成和坑位费，非常容易催生出天价酬劳，但他们短期暴富，需要按照45%的比例缴纳税款。显然，天价酬劳和高额税率，都会让网红们亮瞎双眼，在得到一些“业内人士”指点后，他们开始疯狂地开设公司。据不完全统计，在李佳琦名下有16家公司，薇娅也有12家之多，这些公司琳琅满目、包罗万象，目的是帮助网红避开高收入下的个人所得税，但是税网恢恢疏而不漏，欠国家的税，迟早要补齐。

善待资本，网红的钱应该怎么花？税金部门明察秋毫且相对宽容，允许网红和明星事后补交税款，但更具灵魂性的拷问则是：网红的财富和与其承担的社会责任相匹配吗？不可否认，电商直播的价值在于通过新型商业模式，把生产者和消费者紧密连接在一起，使得商业交易效率大幅度提升，交易成本也因此降低。薇娅们的核心作用在于“优化交易流程”，更确切地说，网红直播只是一种渠道，科技属性并不高；平台提供技术、商家提供货源，网红成为中间商，肆无忌惮地汲取超大规模市场中的人口红利。况且，在资本的加持下，头部主播“欺负”商家的情况日益严重，从中牟取更多利益的机会也变得更大，更加地凶猛。

事实上，薇娅、李佳琦只是中国资本走向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中国企业和欧美发展的不同路径。比如阿里、京东、字节跳动等企业，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声名显赫，但他们

只是在“流通环节”中下功夫，外强中干；而美国企业如苹果、Google和甲骨文，更擅长在科技、算法、设计等底层下功夫，堡垒坚实。

或许是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可能是中国企业已经进入“依靠科技和实体”的阶段，方有大量的严格监管出现。自2021年开始，管理者可谓出手频繁、稳准狠，正引导中国资本走向正途。除了薇娅、雪梨等主播需要缴纳税款之外，对娱乐明星也有类似的操作，比如要求范冰冰补税8亿元，而且发布“娱乐明星限薪令”；更深刻的事件则是冷酷的“双减政策”，把中国教育从资本的裹挟之中解救出来。尴尬的是，俞敏洪虽无力拯救新东方，但扭头就带着老师们直播带货，且乐在其中；此外，恒大地产、蚂蚁金服、元宇宙等非实体产业，也陆续进入严格的管控时代。基于这些事件，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中国资本大概率会流向如下几个实体领域：

首先是制造业，需要资本协助其完成智能制造体系升级，减缓人口红利消失的压力，并利用资本搭建起新型的职业培训体系；其次是高新行业，包括芯片、材料、电池能源等等，还有就是抗疫所需要的资本等等。总之，让钱流向正确的方向，不仅对于社会和普通人有好处，也对网红薇娅们有好处：拥有巨额的财富，好似拥有一江春水，需要驾驭财富的心态和造福社会的手段。  
(科技新发现 康斯坦丁/文)

(上接第48版)刘子健先生认为它是居于王安石新政的核心地位，是相当有见地。事实上，它后来确实不得不恢复，即使在清算王安石最烈的南宋，免役法照旧施行，并且还成为了以后中国所有王朝的基本制度之一。如果说操作层面的技术问题尚存在见仁见智的妥协机会的话，宏观理念层次的分歧则是横亘于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不可调和的障碍。

我认为，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双方——特别是旧党——宁肯争到鱼死网破、两败俱伤，也绝不肯退让半步的根源。

对于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国家财政亏空问题，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在目标上其实并无分歧。只是对于如何实现目标的正确手段，双方南辕北辙。

王安石采取的是扩张性的思维，他有句著名的话——“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以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应当通过发展生产、刺激消费、扩大经济规模来促进增长，也就是时下人们常说的“做大蛋糕”。

他认为这样一来，不仅老百姓能够从中不断的成长和繁荣中获益，政府也能够获得更多财政来源。“财费则利兴，利兴则虽费何害？”

他的另一句更为有名的话是这么说的：“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就极为准确地体现了他的这种思维。

司马光和他的同党则近乎无意识地默认了儒家政治哲学基于“仁政爱民”原则的一种传统假设：天下的财富有一个基本恒定的量，政府越节俭，攫取得越少，民众留存的就越多，老百姓的日子就越好过。

针对王安石认为国家财力窘困的根源是缺乏善于理财的人的观点，司马光针锋相对地指出：“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皆为善，非国之福。”

因此，无论是司马光还是苏辙，亦或是王安石青年时代的挚友曾巩，无不认为当时的要务是大幅度削减各种不合理的开支。

司马光说，“国用不足在于用度太奢”；曾巩说，“理财之要在乎节用”；苏辙还在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时就上书神宗指出，“丰财”之道并非“求财而益之”，而是废除那些“害财”的“冗吏、冗兵、冗费”……他们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

简言之，经济增长、政府与人民间的分配关系，王安石取的是一种正和博弈的动态思维，而司马光取得则是一种零和博弈的静态思维。而前者已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因为这个缘故，大多数现代人认为王安石远比司马光更懂经济，更加高瞻远瞩。

然而我恐怕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如果人们持有这种观点，恰恰说明他们对经济学是一知半解的，至少没有认真学好经济史。大量的研究表明，人类经济实践中单位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

在之前漫长的几千年农业文明时代，虽不能说经济没有增长，经济规模没有扩大，

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极为缓慢的，往往一个世纪里仅有个位数百分点的增长。这就意味着，那个时候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

打个比方，以前一个人种20亩地，一年产出1万斤粮食；现在两个人种40亩地，一年产出2万斤粮食。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生产扩大了多少，社会财富总量增加了多少，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分配关系就是恒定的：政府多拿走1斤，老百姓就会少留存1斤。

更有甚者，随着易于开垦的肥沃土地的日益稀缺，这种简单的生产要素扩张还必然出现边际效益递减。也就是说，新开垦出来的20亩土地，同样一个人去耕种，一年也许只能产出8千斤粮食……

这就是为什么2000年里中国人民勤劳而不富裕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人口的显著增长，清朝中期中国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有可能反而比一千年前唐宋时期更低，而不是更高！

如果你真的认真研究过人类经济史，你也许就会明白，很大可能恰恰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观点更加符合他们那个时代的客观现实。

事实也是如此，王安石变法的确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国家财政迅速充实。实施一年后，青苗法、市易法和免役法各得到了300万贯、150万贯和800万贯收入。三项叠加，政府收入较前一年增长了20%。

相信这也是宋神宗为什么力排众议，如此信赖王安石的原因。新法一共持续了16年，终神宗一朝始终没有动摇过。

然而，几乎所有的历史记载和后来的研究都证明，老百姓的负担也大加重了。与此同时，新法还进一步扩大了全社会的贫富差距。

不过，以今天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来看，新法的最大弊端还在于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全面和深入的参与。沿着王安石的路径，很难不导致一个持续扩张的庞大而专断的政府。

王安石自己无疑是一个道德品格无可指摘的清官，但他身后那些牢牢举着新政大旗的权相们，最典型的如蔡京和秦桧，无不是欺上瞒下、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奸臣。

他们都信奉王安石的理论，除了一些个人机遇上的偶然因素（例如，蔡京之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外，是不是也包含了一些必然性呢？只有政府权力不断膨胀，政府更多地直接介入市场，贪腐寻租的空间才会更大。

近人梁启超在他的《王安石传》中，几乎把这位北宋宰相捧上了天，但任公毕竟卓识而不凡，他敏锐地意识到王安石的新法是一种“干涉政治”，并不无道理地指出，这种“干涉政治”在立宪法治国家易行，而在专制国家难行。

梁启超还很有洞见地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比附为他自己的时代正在欧洲大行其道的时髦的社会主义。“荆公欲举财权悉集

于国家，然后由国家酌盈济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

虽然他对王安石推崇备至，但对他的新法却明显缺乏信心：“然则公之法其果为良乎？为不良乎？吾卒无以名之也。”

在对王安石的变法作出了基本上倾向于负面的评价之后，我特别想要在本文结束时澄清一个在我看来十分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千年以来，大多数对王安石的言辞凿凿的褒贬都建立在误解或一知半解的基础上。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这场变法的实施程度和真实成效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评估。

笼统地说，尽管新法持续了16年之久，但它的大部分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或者至少可以这么说，没有像王安石本人理想中的那样得到实施。

这一方面是因为它遭遇了激烈的批评和抵抗，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新法的主要内容大多聚焦于经济，但它却几乎完全依赖政府去落实。只要稍懂一点现代经济学的人，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注定了新法几乎必然失败的命运。

具体来看，如果比较公允地说：免役法是新法中最利于弊，也是实施得最好、并对后世造成最大影响的一条，即使最顽固的反对者也欲罢而不得；

争议汹汹的青苗法则远未达到王安石预期的效果。但有人颇有理据地指出，作为王安石最重量级的批评者，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曾经在自己任职的地方上热心推行的“社仓”（亦称“义仓”）制度，不过是拾了青苗法的一些牙慧而已。

虽然朱熹自己竭力辩称，社仓的利息比青苗低，而且采用的不是货币而是谷物实物，但前者只是技术细节，王安石也很容易做到，后者恰恰证明，王安石的方法比朱熹的方法包含了更多现代商业经济的先进理念。

保甲法所引起的争议也极大，但终神宗一朝倒是一直在执行。不过，保甲法在实施过程中的实际功能与设计时的初衷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保甲法的最初意图是为了依靠民间自治来维持地方治安秩序，而一旦组织起来，保甲法也促进了户籍调查和税务征收。

近现代以后，有人将它解释为现代民族国家义务征兵制度的前身，这是不准确的。当然，诚如这些学者所言，保甲作为民兵或预备部队的功能是存在的，但这在当时从未成为其主要功能。

方田均税法在王安石自己执政时就推行得相当有限，后来则基本上是徒有其名了。

其他如学校、科举等制度的改革，都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不久就又恢复到了变法前。

从变法的直接经济后果来看，首先是平均税负水平大大提高，政府财政收入有明显改善。

此外，由于新法大量采用货币手段代替实物经济，全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显著提高了。这产生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新法在商品市场和货币经济更为发达的南方地区运转得相对良好，而在传统农业经济一统天下的北方则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总体上说，王安石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也大多来自南方，而旧党中人则基本都是北方大族出身。这向我们揭示了审视和研究这场变法的另一个独特视角。

定量的经济史研究还表明，新法推行期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王安石本人的诗作中也反映出这一点，当然他是将物价低廉作为一种功劳来自我夸耀的。

理论上说，对货币需求的增长会提高货币的流通速度，从而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一种比较有力的解释是，新法推行期间总体上适逢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因此商品供应充足。这抵消了潜在的通货膨胀趋势。不过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失。

面对当时严峻的财政形势以及社会经济出现的许多崭新变化，王安石在政策和制度上试图作出积极大胆的回音。公允地说，他看到也想到了很多极具现代意味的东西，但他没有发展出具有切实可操作性的政治经济理论。

这或许是因为他的思想归根结底依然根植于传统儒家的框架内，与他的一些激烈反对者的批评正好相反。

但不管怎么说，他所作出的努力终究是值得尊敬和认真对待的。与此相反，旧党的批评意见或许大部分都是中肯的，但他们没有能够拿出什么更好的替代性方案。而我们现在都应该很明白，如果不折不扣地按照司马光的方法，是无法应对当时的现实需要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少有人像王安石那样重要，那样富有争议。可以说，他所发动的这场变法是自所谓“秦制”确立以后直到辛亥革命2000多年里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有影响的全方位、彻底性的制度改革尝试。

而这一改革方案中所蕴涵的惊人的现代性，也足以让王安石这个名字永垂史册。

历史的演进总是一波三折的，王安石新政的许多现代性方案在他的时代或许注定会失败。但如果新法能够持续下去，到了另一个更为有利的时机，例如主要动力和实施者换成了民间的商业主体，也许就会让现代经济破茧而出。欧洲历史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可能性。然而中国的事实并不如此。

如果同将近450年以后的欧洲宗教改革作一类比的话，我们会发现，王安石的变法与宗教改革一样，其长期历史后果都不是事件发动者所希望的，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可惜中欧历史后来的演进正好呈现相反方向，变法受挫以后，中国的精神文化与现实政治越来越转向内向和静态。这颇令人人为之一叹。